

悼 修 斋

汪 子 嵩

知道修斋卧病已经相当长了,近一年来给他去信,他已不能亲自作复,因此有事也不敢再去打扰他。近一段时间听到他病情更加恶化的消息,但总还抱着一点希望;8月25日给一直居留在美国的他的老同学、当年我们在西洋哲学编译会的同事孙霄舫教授去信时,报告了修斋的病情,还说“但愿吉人天相,他能逐渐恢复健康”。谁知第二天就得到苗力田兄的电话,说修斋已经于23日去世了。

我和修斋相识于1945年秋天,在昆明,距今将近半个世纪。当时他刚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由于受贺麟先生的影响,放弃了外交官的前途,来到昆明在贺先生主办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工作;我则刚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康先生的研究生。修斋要补习哲学知识,旁听哲学系一些课程,陈先生讲的“希腊哲学史”和领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他都是每堂必到的。我们除了课堂见面外,又因为同是浙江人,多了一层接触。当时联大学生生活自由散漫,同系同班同学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各种各样的同乡、中学同学以至同(样爱)好、同志(政治上)的小圈子却很多。我们几个来自浙江的同乡常在一起,其中有经济系的王植民(他已于前几年在美国病故),是修斋在绍兴中学时的同学,因此修斋有时也参加进来一起泡茶馆,或是在翠湖边上散步。第二年复原回到北京,修斋仍在编译会工作,我因研究生的津贴不足维持生活,由汤用彤先生和贺先生商量,让我在编译会兼点杂事,领半份薪水。因此我和修斋除了一起听汤先生和陈先生的课以外,其它接触也比较多了。当时贺先生领导组织了一个哲学讨论会,每两周举行一次,由我们每人轮流提出报告,请有关教授指导。后来编译会在中老胡同买了一所小院房子,修斋全家和邓艾民、王太庆都住在里面;我住在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宿舍里,步修斋后尘也由政治学校转来哲学编译会工作的孙霄舫也住在那里。我们有时到中老胡同去,修斋留我们喝酒,吃徐铎做的菜。但是老实说,那两年我们的交情并不深,因为当时政治矛盾十分尖锐,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彼此心照不宣,都绕开这个话题。

1948年底修斋离开北京,南下回家,第二年洪谦先生邀请他到武大哲学系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时,修斋和我才又在一起工作。那时的北大哲学系有几十位教授,许多是解放前著名的专家,不少当过原来的文学院院长或哲学系主任。高教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因此让这些教授也听苏联专家讲课,和学生一样要进行“课堂讨论”。我担任系秘书,实际上是系里党的负责人,但全系教师中只有我和黄枬森两个党员,一切工作只能依靠比较年轻的讲师、助教以及几位教授、副教授来做。5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广大知识分子确实是相信党,

要求进步的。修斋在武大时就要求进步，参加了民主同盟，这时当然成为我们依靠的积极分子。回想当时北大哲学系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的，就西方哲学史方面说，在洪谦和贺麟先生的领导下，编译了许多哲学史资料，成为后来二三十年国内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主要参考材料；在这方面，修斋是做了不少工作，付出大量劳动的。

当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日丹诺夫讲的那一套：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唯物主义是绝对的真理，因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对于这样简单化的教条，大家口头上不得不表示赞成，但对有丰富的哲学史知识的人来讲，实在是无法心服的。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广大知识分子认为这是热烈盼望的春天的来临，不同意见才敢于公开表达出来。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昕先生写的《开放唯心主义》，郑先生还是从改造思想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他说“只许批判，不许辩护，唯心主义思想掩藏得愈深愈牢靠”，只有让“批判和辩护唯心主义是自由争论的两方，这就给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以无限自由的感觉。自由是改造的起点。只许批判，不许辩护，就很难使人心服。不能心服的拥护和不能心服的批判，都是不彻底的，表面的，尽管唯心主义是不正确的，但容许有辩护唯心主义的自由，就能激发一个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乐于改造自己和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逐渐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²³日又发表了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冯先生直接指出：“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冯先生所指的就是按照当时的理论，中国古代哲学几乎全得否定，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所以他接着又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提出：中国哲学史有些命题既有抽象的意义，又有具体的意义；按其具体意义说，许多命题都没有进步作用，是只能否定的；但“就其抽象意义说，则有进步作用，是可以继承的”。这就是著名的、在当时及以后受到批评的“抽象继承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由北大哲学系召开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在1957年1月下旬召开的，会上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另一个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前一个问题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贺麟先生和修斋。他们认为：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只有矛盾的斗争性，还有矛盾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因此唯心主义中也有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他们以许多哲学史事实论证：在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家对唯物主义的批判有正确性，这种批判推动哲学史的发展；而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伟大正确，是因为它“不但继承了历史上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也吸收了历史上唯心主义的优点”。贺先生说：过去的批判“是有缺点的，这主要就是有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也不够辩证和唯物。所谓不够辩证，是说把唯物、唯心两者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绝对对立，没有相互联系、相互继承的关系；所谓不够唯物，是说没有仔细地了解敌情，没有好好地掌握材料和事实，这也是主观主义。”修斋发言补充说：“哲学史上有些思想既是唯心的、非科学的，又何以能有进步作用？我考虑到这一部分是因为把唯心、唯物与错误、正确等同起来了的缘故。这种看法很流行。唯心的就是错误的，因此就不能有好东西，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唯心论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可以肯定的东西，是有贡献的。”座谈中虽然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主要一派的意见就是针对贺先生和修斋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因此会后修斋又写了《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将批判他的论点概括为：“（1）唯心主义哲学有的著作中是可以包含着一些正确的东西的，而这些东西正因为是正确的，因此必然是与唯心主义相矛盾的；（2）唯心主义的少数论点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起进步作用,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并且这些论点也还是完全错误的;(3)唯心主义可以起促进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一种反面的刺激作用;(4)因此归结起来,必须肯定唯心主义本身,或者说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总是绝对错误的,也不能说唯心主义本身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否则就会模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修斋在文章中列举大量哲学史事实,对这些论点一一进行了反驳,目的是要说明:“有些本身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

我在这里比较具体地介绍这场讨论的情况,摘引了当时许多原话和论点,是因为这段历史在现在已经很少提到了;许多比较年轻的哲学工作者大概还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讨论会,他们也许会感到惊奇:怎么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呢?我以为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对研究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对理解极左思想对哲学研究的危害,都是很有必要的。好在有关这次讨论的全部文章已辑成《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一书,由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

我在这里介绍这场讨论,还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明修斋性格的一个典型方面——他的耿直性,有话总要说出来,凡遇到他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总要争辩到底。现在也应该承认,那次座谈会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真正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既允许批评,也允许辩护,是那三十年中极少有的一次。但它终究是开始的第一次,在长期“只许批判,不许辩护”的情况下,许多人的发言还是有保留的,并没有直抒己见,而批评方面却仍旧是那么气势汹汹。在会上,修斋的观点和贺先生的观点一起成为批评的靶子,而且批评者还是当时理论界的权威;可是修斋并不为其所屈,在会后(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暴风雨的前夕了)还要继续撰文,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反驳对他的批评。这在当时确实是使朋友们为他捏一把汗的。

他的这种性格在平时也常有流露,遇事往往要据理力争,很少考虑对自己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在这次讨论会上的表现,又加上后来“大鸣大放”中的一些言论,他立即成为政治运动中的重点之一。幸亏他早已是李达校长为建立武大哲学系从北大调聘的教师,武大哲学系已经正式开办,赶快催他去武大报到,离开了北大。但他终于没有能完全逃脱这场厄运,仍旧蒙受了几年不白之冤。多年来修斋虽然一再遭受挫折,但他并不因此改变性格,听说以后还发生过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这一生中坎坷不少。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自己也逐渐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1978年在芜湖开西方哲学讨论会,我没有参加,修斋将他的论文《从莱布尼茨的与狄德罗的哲学看对立统一规律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表现》寄给我,我看他是重新捡起二十多年前的论题,现在可能痛痛快快地阐述他的思想了。我和他在许多看法上已经一致,以后几次会面也就没有什么隔阂和顾忌了。

修斋性格的另一特点是他的做事认真。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答应做,便一定认真负责到底。他一贯从事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从最初翻译罗斑的《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起,后来为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做了不少重要的译校工作,直到十年动乱时期他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莱布尼茨的巨著《人类理智新论》,都是十分细致负责的。我还知道一件小事:1989年冬商务印书馆开过一次讨论翻译的会议,会上大家谈到西方哲学中最缺少的是中世纪哲学资料的翻译,这部分工作是由傅乐安教授负责的,他说找适当而又愿意翻译的人选很困难,修斋就自告奋勇,说他可以组织一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翻译一部分资料,并且由他亲自负责校改。后来我听傅乐安说,修斋答应负责的这部分稿子都已按期完成,经修斋自己动手修改,改得非常认真,而那时候修斋自己已经在病中了。

修斋是国内唯一的研究莱布尼茨的专家,1980年哲学规划会议确定要编写一部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时,我们就决定“欧洲大陆理性主义”部分请修斋负责,他同意了,并已着手做准

备工作。后来多卷本改为分段研究写作,我们多次催请修斋主持的唯理论部分早点上马,但他坚持欧洲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是互相争论互相促进的思潮,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他考虑的已经不只是一部书的写作问题,而是考虑到国内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上,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一部分相对地说来比较薄弱,因此他和杨祖陶等同志下决心要将武大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建立成为国内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中心。这十几年来在修斋主持下,他们孜孜不倦地做了不少工作,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初期在内部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成果,象这样一个有中心任务、有共同目标和志趣的学术研究集体,在国内哲学界还是少见的。他们培养了几十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有些已经发表了优秀的著作,成为这方面的研究骨干,可谓后继有人。1986年出版的由修斋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他们的第一个研究成果,这部书以丰富的史料说明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产生的前因后果,详细介绍了它们的主要思想代表以及他们进行的论战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各自的观点。这是一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自己创新观点的哲学史著作,引起哲学界的重视。在这基础上1988年他们又承担了“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哲学”的课题任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由此可以看出修斋是怎样精心殚思,将这段哲学史的研究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各方面深入展开。他已经付出了毕生精力;我希望,同时也相信武大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会继承修斋的遗志,将这方面的研究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更加发扬光大,为这片哲学史研究的园地增添更加丰硕的成果。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修斋自己对莱布尼茨的哲学有许多年精深的研究,却没有来得及给我们留下一部他亲笔撰写的专门的著作。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修斋一直孜孜不倦地培养年轻一代,以大量精力和时间去讨论和修改他们的成果,舍己耘人;加上不如意事的纠缠,他的身体又越来越弱,以至不能给我们留下这份重要的遗产。但是,据说他在重病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莱布尼茨研究》一书的著述和出版,他把完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交给了后学,并商定了全书的大纲乃至某些具体细节。写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修斋那清瘦苍白的面容,带着咳嗽,躺在病床上,勉力同后学一起讨论和推敲的情景。我只能含着泪说:修斋,安息吧!你的遗愿一定会实现的。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

(责任编辑 彭昌林)